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朱熹

ZHU XI

李魁平◎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朱熹

李甦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李甦平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0. 6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508-5

I. ①朱… II. ①李… III. ①朱熹(1130~1200)—
传记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220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欧阳常贵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朱熹

ZHUXI

李甦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千

2010年6月第1版 ·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15-4508-5

定价: 16.80元

目 录

第1章 一代宗师——朱熹的价值	001
一、受学李侗	001
二、仕途政绩	004
三、构筑理学	006
四、朱学遭禁	010
第2章 理学大成——朱熹的性理思想	014
一、理气变易	015
二、格物穷理	027
三、尽性明理	039
第3章 匡救时弊——朱熹的经济思想	052
一、开源节流	052
二、以农为本	059
三、贫富合礼	065



001



002

第4章 黄序育材——朱熹的教育思想—— 070

一、明义返本—— 070

二、六艺教本—— 077

三、博学慎思—— 081

第5章 乾坤造化——朱熹的科技思想—— 093

一、宇宙学说—— 094

二、天文学说—— 104

三、气象学说—— 113

第6章 誉满全球——朱熹思想在海外—— 122

一、日本朱子学—— 122

二、朝鲜朱子学—— 135

三、越南朱子学—— 144

四、欧美朱子学—— 147

附

年谱—— 152

主要著作—— 154

参考书目—— 154

第 1 章

一代宗师——朱熹的价值

朱熹，字符晦，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年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赵扩庆元六年（1200）。

朱熹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高宗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朱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从事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和初涉政坛的阶段；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光宗绍熙五年（1194），朱熹中年至晚年时代，是多次参政和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的阶段；第三个时期，从光宗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到庆元六年（1200），朱熹的暮年，是宁宗诏免朱熹侍讲职位，理学遭到禁止阶段。

一、受学李侗

据《宋史》本传和《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记载，朱熹从小就很聪明，非常人可比。当朱熹刚牙牙学语时，其父朱松指

天说：“这是天。”朱熹问其父：“天之上是何物？”他父亲对此惊讶不已。孩童时的朱熹常常独自在地上用手指画沙，而他所画的并非一般图画，却是八卦图。虽然史书对朱熹的这些赞誉有夸大之处，但朱熹从小就注意探讨“天之上是何物”这个曾经困扰无数哲人的宇宙最高本体问题，为他后来建立“理学”哲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朱熹从小就在其深受二程（程颢、程颐）理学熏陶的父亲的直接教育下，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朱子年谱》说：朱熹十来岁，就“厉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当读《孟子》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十来岁时，读《孟子》，知圣人与我为同类，喜不可言。”朱熹就是这样，从人皆可为尧舜的意義上来体会“圣人与我同类”，因而，他也以做圣人自己的目标。

朱熹 14 岁时，他的父亲朱松病逝。朱松死前对朱熹说：“我有三位好友，他们是藉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人都很有学问，令我敬畏。我死后，你要向这三个人请教。我也就死而瞑目了。”朱松死后，朱熹遵父遗言，从建州（今福建建瓯）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受学于三人。

由于胡原仲和刘彦冲喜好佛、老，常将儒书与佛教相糅合，企图调和儒佛。这在当时士大夫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一现象对朱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年轻好学的朱熹，虽以儒家经典为其学习的主要内容，然于佛家、道家，也无不过问；于禅道文章、楚辞、兵法，也事事要学。这种广涉于儒、释、道的学风，为他后来融儒释道为一体，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绍兴十七年（1147），18 岁的朱熹参加建州“乡贡”。“乡贡”考官蔡兹说：“我取中一后生，三篇策论皆为朝廷措置大事。这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青年时代的朱熹就是一位有志

向、有抱负的人。

绍兴十八年，19岁的朱熹考取了进士，取得了最高的学衔。三年后，未满22岁的朱熹被宋王朝授予左迪功郎，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秋天，24岁的朱熹到同安县任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即使是初涉政坛，朱熹也不忘却读书。他认为虽然自己考取了进士，迈上了仕途之路，但做学问的道路却刚刚起步。他总结自己20岁以前的学习是广泛摄取，但贪多嚼不烂，所以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思量“义理”和融会贯通上，这在学习方法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常常废寝忘食。他说：“有时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甚至三、四个夜晚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直到把“义理”理会透彻为止。

朱熹在自己刻苦读书、钻研义理的同时，又企盼着寻找一位引路的明师。几经辗转，绍兴三十年，31岁的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1039～1163）是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而罗从彦则是二程弟子杨时的学生。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有一次，程颢送杨时南归时说：“吾道南矣！”程颢死后，杨时又跟程颐学习。当时，在士大夫之间盛行佛学，但杨时跟“洛学”不变，因此得到程颐的赞赏，被称为得二程“不传之学”的弟子之一。南宋初，杨时在南方的声望很高，因此，罗从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所以，罗从彦被称为杨时的嫡传弟子。李侗又从师于罗从彦数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所传之奥，得罗从彦“亟称许”。当时，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曾师事罗从彦，与李侗“为同门友”。

朱熹拜李侗为师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

朱熹十七八岁左右还留恋于佛学，初见李侗时，还曾以禅学就问于李侗的话，那么，此时则专心于儒学了。

朱熹依李侗的教导，只需看“圣贤言语”，又要求他从“圣经中求义”，以便推见“实理”。朱熹潜心读书，逐渐悟出求“理”的方法，就是“静坐”。关于静坐求理的方法，朱熹说：“所谓静坐，就是使心中无事，这样，‘天理’便会显现出来。而‘天理’显现，则心越明越静。”这是说，只有心静，才能体究人伦，才能明白“天理”。以静求理，这是儒家圣人求道的途径。由于朱熹既能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求教于李侗，又能领悟圣人之说，悉心求道，因而得到了李侗赞扬：“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并被誉为“乐善好义，吾觉鲜有”的人物。于是得李侗之正传。这样，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系谱中的重要人物。

二、仕途政绩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赵构在朝野一片反对和议、主张抗金声中退位。孝宗赵昚继位后，支持抗金，并诏求直言。于是，主张“以战复仇”，认为“讲和”是叛逆“天理”的朱熹，以监潭州南岳庙的臣职向赵昚上《封事》。在《封事》中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贤明君主之学。他要孝宗皇帝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诡之说，遍访真儒，置诸左右，以备顾问。这样，才能治国平天下。

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所谓“修攘之计”，

就是“修政事，攘夷狄”。他明确指出，我们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抗金则“义理”明，而讲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朱熹反对和议，主张抗金。

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他认为“四海之利病”，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系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对于“肆虐以病民”的官吏，即使是宰执召谏的“亲旧宾客”也应该斥而去之。因而提出“正朝廷”、“立纪纲”、“厉风俗”“选守令”的主张。如此，才能国富民强，才能抗击金兵。

在这部《封事》中，朱熹数说和议之害，复仇之利，反和主战态度十分鲜明。

乾道三年（1167）秋，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命朱熹视察水灾，并与县官议论“赈恤”之事。他遍访崇安各山谷，十日而返。经这次视察，不仅有“令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之感，而且有“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之叹。由于水灾严重，粮食无收，因而到次年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崇安发生大饥荒，随之爆发饥民起义。朱熹劝说豪民发藏粟，以赈济下民。后又请朝廷以“粟六百斛”赈济饥民，使矛盾得以缓和。由此，朱熹得到一条教训：不能竭泽而渔，否则便会激起民变。因而他主张“设社仓”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粮食困难的问题。朱熹认为设立“社仓”有许多好处。既可在新旧未接之时，向“社仓”贷谷，取息什二，而可不向“豪民”高利贷谷；又可在收成不好时，出息减半。如大饥，则可全免。对于无劳力的鳏寡，则可免除利息。其中最大的好处是可杜塞发生祸乱，即农民起义的根源。因为“盗贼”窃发的端始，往往是由于饥饿。因此，他以“社仓”为近古救弊补病的“良法”。乾道七年，朱熹又在五夫里创立“五夫社仓”，后又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进行推广。并且，

他还把“社仓”法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加以比较，认为“社仓”法比“青苗法”还优越。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次年，朱熹知福建漳州。在漳州期间，他做的主要工作是主张行“经界”，即对土地进行核实田亩、画图造册、以田交税。朱熹看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虽被官僚地主兼并了去，但产量和税额并没有划归官僚地主，“业去户存”。因而，出现了贫者要缴“无业之税”，而官僚地主却“有业而无税”，这使国家有坐失常赋而造成岁计不足的弊病。朱熹为了纠正这种“田税不均”的现象，而主张“正版籍”、核实田亩，“随亩均户”，均田税。这无疑是使豪家大姓不便，而有利于政府、“细民”的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朱熹出于民族主义，积极主战反和，复仇雪耻。他又基于对南宋社会弊病的认识，提出了设“社仓”、主“经界”的改革措施，企图补救时弊。但由于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行。

三、构筑理学

乾道四年（1168），朱熹完成了《二程遗书》的选编，通过此书，他宣扬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说教。

淳熙二年（1175）夏，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朱熹、吕祖谦和张栻被世人称为“东南三贤”）乘访福建朱熹回浙江金华之便，约陆九渊兄弟至江西信州鹅湖寺，以图调解朱陆学术分歧，史称“鹅湖之会”。会前，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俩统一了思想。在鹅湖会上，主持吕祖谦首先问陆九龄：

“近来有什么新观点？”陆九龄吟诗说明他的观点，诗道：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

诗念了一半，朱熹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的船了。”陆九龄这首诗的意思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亲亲之仁，敬长之义，便是圣人孔孟相传的“本心”、“此心”，即“仁义”之“本心”；“仁义”之“本心”便是一切的基址和本原，任何意识、行为、视听都由此出发，才能发扬光大。否则，便成无基之大厦，无址之高山；求“本心”之方法是，既不留情于纷纭繁杂的传注，亦不着意于文句读解上的辨析精微，只是超脱此种蓁塞和陆沉，才能直指“本心”；友朋的切磋琢磨，在于继承圣学，发明“本心”。

这便是陆九龄的新观点、新思想。诗罢，继续进行辩论。陆九渊说：“我也和家兄诗一首”，诗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朱熹听到第五、六句时，便“失色”，诗念完后，更是不高兴。陆九渊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见墟墓而兴起悲哀之情，瞻宗庙而有钦敬之心，此情此心，便是千古不灭的“本心”，亦即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千万世之前、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的“心”。陆九渊认为，陆九龄诗的第二句“古圣相传只此心”微有缺陷。因为要“传”古圣之心，便要读古圣贤的书，岂能不留情于对古圣贤书的传

注？此便有自相矛盾之嫌。陆九渊以“斯人千古不磨心”，即我的心与古圣贤之心，不仅“同此心”，而且“同此理”，其心千古不磨，自无需“留情传注”，较陆九龄彻底或高一等；此千古不磨之心，则是一切的根基和本原。譬如沧溟之水，是由涓涓细流积成的；泰山华山之高，是由拳拳小石堆成的。自然与社会中一切繁杂的现象，都是由“本心”演变和呈现的；体认本体“心”的方法，是“易简”，即切己自反，直指“本心”，而不要“留情传注”或一件一件地“格物”，“易简”的工夫终究要发扬光大。“支离”，便是支解离散；没有抓住本体，而烦琐庞杂，所以，“支离事业”是不能长久的。因此，哪个“真”，哪个“伪”，今天是首先须要分辨清楚的。

由于朱熹对陆氏兄弟的两首诗大不悦，便各自休息。

第二天，朱熹与吕祖谦二人商量数十折议论，但均被二陆破其说。会议讨论了三天，便宣告结束，不欢而散。

五年之后，朱熹和陆氏兄弟诗一首，诗曰：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诗第五、六句之意是，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为学更为尽精微。第七、八句，朱熹以陆学为“无言”之学，不信古今，而坠于空疏，有与禅学圆通之嫌。

鹅湖之会明确了朱子学与陆学在“为学之方”上的分歧，即朱子学主张“即事穷理”，强调“格物致知”，而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陆九渊之学侧重于“发明本心”，自称为“易简工夫”，而被朱熹讥为与禅同调。此后，人们称朱子学为“理学”学派，陆学为“心学”系派。（以上参阅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第

淳熙四年（1177），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编成。他首先编成《论语集义》和《孟子集义》，然后按理学的观点取其“精粹”为《集注》，又把为什么这样取舍的道理和给学生的问答编为《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同时，还完成了《周易本义》和《诗集传》的编写。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编成标志着朱熹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

淳熙五年，朱熹在庐山唐代文人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白鹿洞书院”。在《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由此，白鹿洞书院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中积极宣讲理学思想，培养了一批学生，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淳熙十六年，朱熹在漳州任职时，首次刊刻四经，即《书》、《易（本义）》、《诗（集传）》、《春秋》，以及四子书，即《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宣扬他的理本论哲学思想。

庆元元年（1195），朱熹以65岁高龄，在湖南创办岳麓书院，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朱子年谱》记载说：先生（朱熹）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除办岳麓书院外，朱熹还修建了武夷精舍，创立了紫阳书院等。通过这些书院，朱熹培养了许多学生，向大江南北传播他的理学思想，形成了独立的学派——朱子学。

四、朱学遭禁

庆元元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继位。八月，经赵汝愚推荐，任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初见宁宗，便上《行宫便殿奏札》。他大讲“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和“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等“大伦”、“大本”的封建伦理道德。他任侍讲后，除单日外，每逢双日，早晚进宫两次，向皇帝宣讲《大学》。朱熹进讲的基本精神是“为君者不知君之道，为臣者不知臣之道，为父者不知父之道，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皆由此学不讲之故也”。故朱熹对皇上说，寻天下之治，就是要明“君道”、“臣道”、“父道”……舍此而他求，就错了。

朱熹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四事：

第一，停止修葺东宫的劳役，以慰流离饥饿的难民。

第二，皇上应下诏自责，以减省舆卫。

第三，振肃纪纲，以尊严朝廷。为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

第四，寿皇之遗体，只可安于内，这样，则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

此外，朱熹还在宁宗面前斥责大臣韩侂胄。

这些举动引起了宁宗的不满，认为朱熹是越俎代庖，干预朝廷事务。十月，宁宗免去了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上书竭力

固谏，要求留朱熹，宁宗不听。此外，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等，也都交章留熹，但宁宗仍不准。工部侍郎黄艾后问宁宗，为什么逐朱熹，宁宗说：“朱熹对朝廷之事，事事干预，而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这样，朱熹被罢出朝。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后又更名为沧州精舍。

同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被罢出朝。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随着韩侂胄的掌权，一场反朱子学（理学）的斗争便开始了。

庆元二年二月，叶翥上书请求把理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并将朱子学斥为“伪学之魁”。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有十大罪状：

1. 不给母亲吃好米，不孝其亲；2. 不敬于君；3. 不忠于国；4. 以辞职名义玩侮朝廷；5. 赵汝愚死时，朱熹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6. 信妖人蔡元定邪说，有损于风教；7. 诱引两个尼姑以为宠妾；8. 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却说这样能齐家；9. 为官时在漳州妄行经界，在浙东多发赈粮；10. 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等。

是年，朝廷将朱子学更名为“伪学”，规定《六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为禁书，降朱熹二官，即秘阁修撰和提举南京鸿庆宫，并决定“伪学之党”（朱熹弟子等）不准在朝廷做官，甚至有人上书要求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四年，朝廷下诏要理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如再“遂非不悔”，“必罚无赦”。并订立《伪学逆党籍》，于是“伪学”便成了“逆党”，计有宰执四人，侍制以上十三人，余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五十九人。使得朱熹的门

人故交过其门而不敢入，甚至使他的弟子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一时间，“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儒者不敢以儒自命。

然而，面对此情此景，朱熹坦然自若，一笑了之，或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终日伏案疾书，临死前，尚在桌前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死后，他的学生们想给“伪师”送葬，但也受到歧视和限制。朱熹死时，朱子学还处于被排斥、受打击、遭禁止的地位。

朱熹死时 71 岁，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立朝仅四十六日，为官十年，其余四十年时间都从事讲学和著作。在政事方面，朱熹设崇安“社仓”、主漳州“经界”、弹浙东豪右、解南康饥荒，显示了他的管理才干；在学术方面，朱熹虽被诏免侍讲，但他一生仍讲论、著述、编辑、撰注不已，直至风烛残年遭庆元党禁之际，仍编纂《礼书》、集注《楚辞》，学业辉煌，终开一代理学宗风；在教育方面，朱熹承随政兴学，建武夷精舍、办岳麓书院、创紫阳书院、复开白鹿洞书院，引“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使其门人弟子遍布天下，得“朱夫子”之美称。

朱熹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这是说，他不惧怕他的学术思想在他活着时被当局者所排斥，而深信将来他的著作和思想，一定会流传于世，弘扬天下。

在朱熹死后九年，宁宗于嘉定二年（1209）便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过了一年，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国子司业刘燠请以朱熹《论语·孟子集注》立学，从之”，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官学，作为法定教科书。这样，宁宗就完全否定了他在庆元二年（1196）禁止朱子学的诏令，终于认识到朱熹思